

新世纪以来，人物传记创作出版空前繁荣。正传、文学传、自传、画传、评传、别传、外传、诗传等层出不穷。在这些传记当中“正传”占了很大的比重。所谓正传，是由一级组织或某个机关单位出面，组织写作组写出的传记，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方修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单位出版了一批这样的传记。这种传记的政治色彩较浓，代表着一级组织对传主的评价，因而具有政治上、史实上的权威性。这对于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 的官方材料。但其中部分传记，存在着“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问题。有的出版后就被束之高阁，很难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因而也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最近，我们惊喜地看到，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余秋里传》，在官方修史和读者欣赏间找到了一种巧妙的平衡。既有宏大的时代背景的铺陈，也有对鲜为人知的细节的雕刻，既写出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裹挟向前的历史必然，也充分展现了传主的个性色彩和个人魅力。

《余秋里传》用史记笔法，着力刻画了传主波澜壮阔而富有传奇的一生。用看似朴素实际很有张力的语言，把这种传奇写得绘声绘色。大家都知道余秋里是我军著名的独臂将军，但并不知道他是如何断臂的？

探寻革命史的温度与色彩

革命史应该怎么写才更传神、更有吸引力？这是读章熙建散文作品《战争碎片》时不断盘桓于我脑海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近代革命，肇始于戊戌，勃兴于辛亥，但真正脚踏实地带领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坐标中回望历史、探寻历史，当属革命史写作的历史背景和应有之意。

那么，如何在戏说、调侃、虚无化之风盛行的今天正确书写革命史，这是一个问题。章熙建的写作显然只是在文学范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史研究，或许不该提拔到如此高度。但他路数奇特，信念坚定，数年来以散文方式不断触及的，其实都是革命史框架之内的大量细节内容，而且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为主。他悉心寻访到的这些细节，在“大历史”视野及书写中往往是会被遗漏的。另外，对于革命史的思想态度、价值认知而言，章熙建也是少有的能够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一位作家，他的所思所想与他的理想信念密切相关，他力求知行合一。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史实所涉及地域包括战场的深度探访。从大部分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写作之前，章熙建总是会亲临故地，寻觅遗踪，到那些沉寂多年，甚至已经被今人彻底忘记的土地上走访。他会敞开心扉，从一把土、一块石头、一截松枝那里开启嗅觉，领受思悟。他似乎要先从山川地理间汲取已化为天地之气的英灵和魂魄的强大力量，与那些义无反顾的高贵生命进行一番精神的交流，然后才回到书桌前写作。一般的散文写作，如山水游记之类，写作者也会“在场”，但多半只是闲适的观察者而非专注的探究者、深情的仰慕者。章熙建的探索是虔诚和严肃的，专此造访的意图明显，所以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很可能是在捕捉某种若隐若现的气息，这些气息或者壮烈豪迈，或者悲凉苦涩；他也可能是像地质工作者一般“采样”，取回一些矿物标本，测定其成分，分析其携带的基因，以便展开自己的后续提炼。

向军史及战史资料寻求源泉支撑，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章熙建的探寻足迹偏多江淮地区。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那里都是重要战场，中国军民在此曾经血流成河。普通文献对战事的记载往往只罗列一些干巴巴的数字，伤亡或失踪多少，概略统计罢了。有些部队自编的史料对战役战斗的记录大量详尽，对官兵牺牲人数的统计也不尽全面。章熙建的散文有这方面的自觉。对所涉及的“战场考古”内容，他一般都能提供具体的年月日，具体的地理方位；对我双方的部队番号、编制序列、参战人数、指挥员姓名，也都能做到准确无误。以今天的环境而论，军史、战史资料实际上都是开放的，包括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美国的各种史料，像档案、日记、回忆录等等。任何人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拿来比对，互证自证，去伪存真。我们所需要的，恐怕只是及早摒弃一些作者大而化之的思维习惯。

作者对普通或“次要”战争人物的格外青睐。章熙建的散文作品中虽不乏粟裕、谭震林、彭雪枫这样的著名战将，以及林觉民这样的先驱，但也出现了大量名气不算太大的军史、战史人物，像雷诗颖、杨木贵、王琦、陈浩……说实话，在读文章之前，很多英烈及其事迹我都不甚了了。章熙建的散文给我们一个启示：创造历史者的普通生命，是以不同方式为中华民族贡献力量和智慧的优秀分子，而非仅仅英雄谱系中的几个肖像人物。

章熙建散文的语言特质也值得推崇。一些祭拜先烈和缅怀英雄的文字有一种简单化倾向，但文章内外的情怀，特别是思想和价值体认未必一致，甚至常常悖谬，应景的性质一望而知。章熙建在面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辉煌价值时，并没有因为认知对象的宏大而简化自己的表达，他是敬重的，但不是过分谦恭的；他顶礼于民族精神和正义事业的伟大，也保有个体思想和叙述的充分自由。因此，全书之中的情思、内容是一以贯之的，他的写作、思考和他现实中的信念坚持也是同一的。他找到了面对革命史时的特别方法：“一寸山河一寸血，经过岁月筛选，战争真容的鲜活并非浮动于虬枝主干，而是蕴藏于细枝末叶。拨开时光枯叶的覆盖，探寻战争遗存的闪亮沙砾，发掘绵延巍峨的忠魂铁骨，其实正是对血性魂魄的一种固化与升华！”

在我看来，这既是“方法”，更是一种语气和笔调，一种不可复制的语言。

官方修传的新突破

——读《余秋里传》

□肖 获

他 是如何拖着断臂走完长征路的？作者正是抓住“断臂”这个点，写出了一连串的传奇故事。

在红二、六方面军西征路上的得章坝战斗中，时任十八团政治委员的余秋里看见对面山坡上敌人正瞄准自己所在的地方，情急之中，他推了团长成钧（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空军副司令员）一把，自己的左臂被子弹击穿，骨头打碎了。当时没有条件做手术，拖着断臂开始了艰难的长征，过金沙江时，还掉进了江中。爬雪山，过草地，无时无刻不被疼痛折磨着。直到部队到达甘肃，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余秋里才接受了截肢手术，这时距离他受伤已经192天了。由于缴获的麻药，没有注明剂量，胳膊锯掉后，他却迟迟不能醒来，直到7个小时以后，他才睁开眼睛。失去左臂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一觉睡得真香啊！”

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失去右臂的贺炳炎将军一起，组建一二〇师三支队，号称“一把手”部队。驰骋冀中平原，令敌人闻风丧胆。贺龙元帅曾经说过，“他们两个人都只有一只胳膊，刚来冀中时没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个队伍来。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队伍，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这两位独臂将军，领服装时，手套只领一副，你用一只，我用一只。上衣也时常换着穿。余秋里的右边袖子磨坏了，贺炳炎的左边袖子磨坏了，两个人一调换，“这不都是好的嘛”。 两人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情同手足，创造了军政干部合作的典范……

余秋里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仅仅写出他的传奇色彩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又是官修正传。因而，在这本传记中，作者浓墨重彩写出了余秋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和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解决部队的战斗力问题，他敏锐地发现和着力推动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被称为“一个伟大的创造”。

新中国成立以后，余秋里的革命生涯跨越多个领域，在每个领域都写下了壮丽辉煌的篇章。1958年毛泽东点将，余秋里出任石油部长，这对一位军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余秋里勇敢地挑起了这个担子，和石油战线的干部、工人、科技人员一起顶风雪抗严寒，发起中国石油大会战，叫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为共和国抱了个“大金娃”。

军事文学呼唤如此“试飞”

——评长篇报告文学《试飞英雄》

□刘笑伟

军旅作家张子影的长篇报告文学力作《试飞英雄》，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在各地新华书店、各大网站的销量也取得不俗业绩。可以说，《试飞英雄》以充满阳刚和军事色彩的动人叙事，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中国空军试飞员群体的英雄群像，完美诠释了“忠诚、无畏、精飞”的试飞精神，是军旅作家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一部献礼之作，是近年来军事文学向现实主义开拓的一部优秀作品，也是和平时期如何更好地塑造英雄、唤醒英雄情怀的一部探索之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军事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重镇，理应在歌唱祖国、礼赞英雄方面走在前列。在人民军队实现强军目标的雄伟征程中，更需要记录和传扬这群无惧生死、铸梦蓝天的铁血英雄；在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的壮丽画卷里，更需要英雄精神的鼓舞和激励。《试飞英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呼唤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

一部优秀的作品，总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其实，《试飞英雄》何尝不是在军事文学的广阔天宇里，对和平时期如何塑造英雄、唤起人们英雄情怀的一次有益“试飞”？

《试飞英雄》题材选择之“险”，成就了直面现实的创作。在现实主义创作中，题材的选择很重要。“无限风光在险峰”，越是关注程度高、采访难度大的题材，越容易引起读者的青睐。试飞是“为国舍己”的奉献飞行，更是随时可能牺牲的极限飞行。试飞员们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人民空军的发展，毫不犹豫地将在生死置之度外，对和平时期如塑造英雄、唤起人们英雄情怀的一次有益“试飞”？

《试飞英雄》题材选择之“险”，成就了直面现实的创作。在现实主义创作中，题材的选择很重要。“无限风光在险峰”，越是关注程度高、采访难度大的题材，越容易引起读者的青睐。试飞是“为国舍己”的奉献飞行，更是随时可能牺牲的极限飞行。试飞员们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人民空军的发展，毫不犹豫地将在生死置之度外，对和平时期如塑造英雄、唤起人们英雄情怀的一次有益“试飞”？

《试飞英雄》介入生活之“深”，找到了最富色泽的故事。官兵需要军事文学，军事文学也需要官兵。一个优秀的军旅作家，一定是离官兵最近的人。只有军营火热的生活，才是军旅作家最重要的创作源泉。16年来，张子影一直在试飞部队深入生活，一有机会就和试飞员们接触，早已成为他们的朋友。16年的生活积累，使《试飞英雄》中关于英雄的描写惟妙惟肖，关

娃”。他培育出了“铁人精神”“三老四严”作风，让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人大会上底气十足地向世界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都可以自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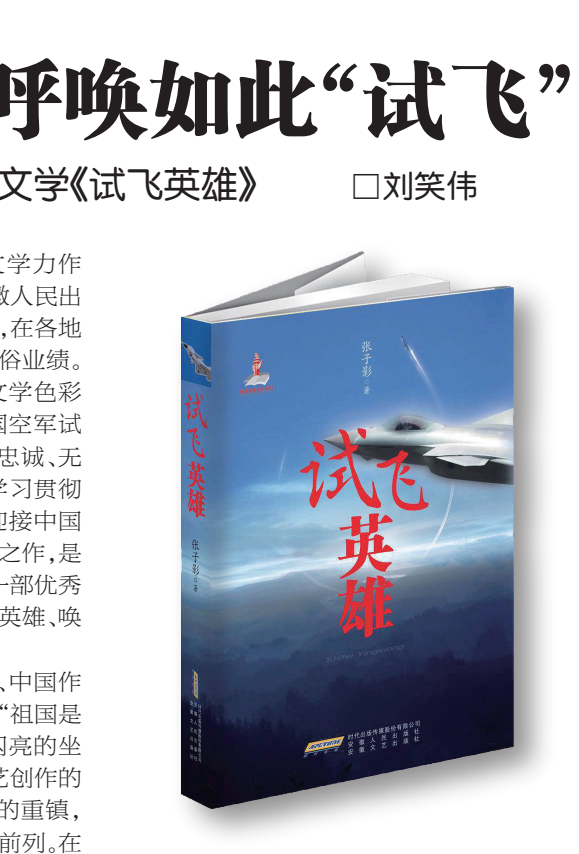
“文革”中，他白天被揪斗，晚上回办公室进行生产的指挥调度，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努力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各地发生的重大紧急问题，千方百计地维持生产建设。在当时大的政治背景下，他的努力虽然很难扭转局面，但对减轻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离开军队24年后，邓小平点将，余秋里重披戎装，担任原总政治部主任。虽然已经接近职业生涯的尾声，但他丝毫没有懈怠之意。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兴起的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为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促进军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百万大裁军、加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工作中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余秋里传》中的人物形象，既是高大的也是平凡的，既是叱咤风云的也是冷静隐忍的，既是铁面无私的又是充满感情的。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听到弟弟埋怨他“六亲不认”，不为家乡办事时，他没有解释，只是说：“我绝不做违反原则的事情。”当听到“铁人”王进喜生病的消息后，立即设法让王进喜住进了301医院，王进喜病逝时，他正在外地主持一个会议，秘书告诉他时，他竟然潸然泪下，使得会议不得不停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余秋里批评别人时，可谓暴风骤雨，“刮胡子不打肥皂”，叫人不来台，当他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时候，他能在大会上向下属鞠躬道歉……

就他的个人生活而言，既是有声有色的，又是枯燥无味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曾问他：“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他回答：“工作。”“你业余时间喜欢参加哪些活动？”他回答：“工作。”他说：“我的生活就是工作，业余生活也是工作。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看到这里，有人会笑他傻，有人会说他亏，有人会说他没有趣味，但你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不能不承认，他和他的同事们是这支军队、这个国家和民族走向复兴的脊梁。

这才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余秋里，一个活生生的余秋里。



于试飞的惊险如在眼前，关于英雄的奉献如数家珍。没有介入生活之“深”，就没有《试飞英雄》面世后在读者心目的分量之“重”。作者说，“那些年里，我常常创造各种机会去到他们中间，像一个新兵怯怯地跟在老兵身后，又像一个老兵混迹于新兵之中，感受、触摸他们鲜活的、质感毛茸茸的本色模样——没有目的，不设防备，蛻去了一切矫饰的原始状态”。正因为如此，作者才感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试飞人的心跳，理解了他们丰沛的情感世界，接近了他们牺牲与奉献的精神高地。

《试飞英雄》书写方式之“独”，拓展了塑造英雄的途径。和平时期，塑造英雄不易。一个通病是，英雄形象和读者有“距离感”。一方面，军旅作家们可能会受到传统典型塑造“高大全”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作家的书写方式也有关联。《试飞英雄》在“把英雄拉近、使英雄可亲”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作者把英雄们放在事业、家庭和亲人的多维维度下进行书写，正是这些日常生活的平凡，彰显了试飞英雄们的伟大。作者善于刻画细节，让英雄人物在细腻的心理中展现出人性的光辉。比如，写出了徐勇凌驾驶的飞机从起火到坠落的42秒；写出了沈晓毅本可自救，却选择避开人群而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爆炸声；写出了英雄回家时，刚掏出钥匙但大门已打开的亲人的爱与担忧。作者还以女性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感知，用满满两章的篇幅，书写了试飞员妻子们的酸甜苦辣。这些，对于塑造英雄亲切暖人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王昂、李中华、邹延超、雷强、滑俊、黄炳新、李国恩、徐勇凌、王文江、卢军、余锦旺、杨晓彬……一个个试飞英雄活灵活现的生动形象，永远留在了军旅文学的精美画卷中。《试飞英雄》给军旅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军事文学呼唤更多这样的优秀作品！

年逾古稀的将军诗人朱增泉，刚打完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捧出5卷本洋洋130万言的《战争史笔记》之后，未及解鞍少驻，又沉浸到《红楼梦》诗词曲赋中去了。从烽火硝烟的古战场转身到花柳繁华的大观园，由苍凉的斗门胡笳切换为缠绵的江南丝竹，一张一弛，倒也正合文武之道，只是红楼凭一书而成一门显学，前人之述，早已汗牛充栋，如作者所言“红学常红，深不见底”，即以其诗词的“单项研究”而言，学者专家，也大有其人，已有多个版本在前，不啻以“业余段位”侧身其间，是要有一点勇气和底气的。

作者的勇气，源于“红学常红”的美学判断。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常读常新，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部红楼，每一个读者不同时期的阅读又会有不同的感受；作者的底气，不但源于此前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的丰富著述，更源于历经半个世纪军队实际工作历练的辩证思维，已经深入骨髓溶于血脉，登高望远，自有别一番风景，于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全钞》，便能自成一格，为“常红”的红学再添一抹殷红。

体例编排，是作者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作者首先斟酌版本，勘定异同，将一百二十回245首（篇）诗、词、曲、赋、联、令、谜、偈、歌，分回悉数收录，而《全钞》文本呈现最醒目之处，是将作者245幅书法作品缩小影印，置于正文之前，一则与所录诗词构成互文，二来行草潇洒，装饰页面，相得益彰；诗词录于中，再以按语接于后，展开解读。按语所写，也并非诗词的简单诠释串讲，而是将其置入到原著语境中，以见其意涵，却又不是对原文的照录，而是引中而有评，评从引出，且牵连全篇，环顾首尾，不拘泥于一章一节的内容。在评述的文字风格上，简洁而雅正，尽量与原著行文风格谐调一致，是作者努力把握的尺度。如此这般，读毕《全钞》，不啻于把红楼全书，又从头至尾温习了一遍。这些看似形式问题，反映的却是治学的思想方法。

比体例编排更内在的美学价值判断，是对红楼诗词“定位”的独到见解。《红楼梦》是中华瑰宝，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顶峰，也为世所公认，自不待言。那么，将同样的评价赋予红楼诗词是否恰当呢？以往论著，便多有阐释过度之嫌。作者则跳出红楼，将其诗词置于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唐宋词词的宏大背景之下，便“立刻被高峰耸立的群山所淹没，不显其峰峦”了。作者对第二十三回宝玉所作的四首即事诗，便作了“诗品、辞藻均一般”的评价，并借曹雪芹嘲讽“一等势利人”，对贾府十二岁公子所作溢美不绝的趋炎附势之态，无疑有点醒时弊之效。吟诗赋文，可以而且必须有作者的情感投入，甚至在鉴赏阐发上，也认可“趣味无可争议”的审美现象的存在，而一旦涉及价值判断，则毫无疑问必须尽量将主观性放在一边了。

与此相关联的，是将《红楼梦》定位于“政治历史小说”一派，这诚然也是红学的重要一支，有其学理上充分的合理性，但以往有些文章往往过度执著于政治层面的探幽发微，有意无意拔高其思想性，这也是作者力图避免的倾向。作者并未否认《红楼梦》“对封建制度、封建官僚家族的强烈批判色彩”，但他认为这种批判动力，是源于曹雪芹因家族败落而饱尝的人世辛酸的“切身感受”而非“思想认识”，因此其批判“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作者在解读《红楼十二曲》的“收尾总曲”《飞鸟各投林》时阐发的这一观点，涵盖了对《全钞》的整体解读。

上述认知，可视为作者对红楼诗词的宏观把握，在具体到一篇一首、一联一语的解读时，作者又自我划定了不可逾越的边界。诗无法诂，系学界共识，越是优秀的诗词，越是享有巨大的阐释空间，而经典则是不可穷尽的。不过这一基本的美学原则在解读红楼诗词时，却不能不受到限制，盖因红楼诗词是特定章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解读便不能脱离具体语境，自成一格式的别解，在常规诗词鉴赏中通常会受到赞誉，而面对红楼诗词，审美的发挥却应当在科学性前止步了。

第一回《中秋咏怀联》，便是一个典型例证，联曰：“玉在桀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联语中“玉”、“钗”所指何人？有研究者认为当指宝玉和宝钗，并从脂批“二宝和传”一语找到了坚实的论证基础，且进一步将此联解读为对宝玉宝钗婚姻的暗示，乍看似乎天衣无缝了。《全钞》的商榷指谬，先从宝玉对宝钗，从未超过“求善价”之心，所钟情者唯黛玉切入，继而将贾雨村中秋之夜所赋五律一首、联语一副、七绝一首相互联系，考证出上联语出《论语·子罕》：“子罕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下联则嵌入了贾雨村的表字“时飞”，得出“玉”乃贾雨村自比，“钗”乃甄士隐家丫鬟，此联乃贾雨村内心世界真实流露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持之有据，合情人理，而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案例，匡正了对脂批所抱的“凡是”态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毫无疑问，245首（篇）红楼诗词，无论是着眼其在全书中的地位，或是着眼其艺术水准，甚至其字数的多少，都并非是“等值”的，按语的解读，便看菜吃饭，量体裁衣，长其宜长，短其宜短，绝不平均使力。且看第十二回那篇《会芳园赋》，写的是凤姐从秦可卿房内出来，绕进宁国府会芳园时眼前景致，无非花红柳绿，莺啼燕舞，以四六体铺排渲染一番而已，很难说别有深意，文字亦无甚艰难处，按语遂只把相关章节略加介绍，告诉读者此赋背景即止，并未在赋文解读上流注。第二十二回黛玉《葬花词》按语却大异其格，因系红楼诗词名篇，便不惜以4个页码篇幅，用心用力，多方切入：首先是依编排体例介绍原著语境以通其意，继而抓住其缠绕回环、细腻绵密的写作特点和凄楚悱恻、真挚感人的情感表达，在鉴赏上写下许多精彩文字，又进一步将此篇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平行比较，从其间韵味的异同，寻找曹雪芹直接、间接接受的文学前辈的熏陶影响；按语的第三部分，则是以“做学问”的严谨态度，考订校勘不同版本中11个字的差异，重点挑出词中6个“依”字，引经据典，牵古连今，审方言之异，明“你”“我”之辨，将《葬花词》解读点点滴落到实处，不啻是一篇扎实的语言学论文。

有些灯谜、酒令的点评，即便是带到具体语境中，也觉得除字面意思外，无法找到另有所指，作者的处理方法则是索性“不解”，其实不解之解，也未尝不是一种解法。文章之妙，有时常妙在生出闲笔。然而面对体量庞大的长篇，若强作解读，硬性发掘出一些微言大义来，难免牵强附会，胶柱鼓瑟，作者显然不屑于列入猜谜索引一派。但作者解诗中，竟也偶尔捎带一两句闲笔，譬如作者以第三十八回《螃蟹赋》三篇，解宝玉、黛玉、宝钗三首螃蟹诗毕，笔锋忽转，有感于《红楼梦》中对螃蟹的种种讲究吃法，感叹“今人吃螃蟹，只饕餮而已，已毫无情趣可言，衰哉！”这便溢出了解诗的传统文体规范，属于闲来之笔了。这样的闲笔，可以使行文少些拘谨，多点活泼。当然应把握分寸，宜少不宜多，故作者只在这一处无意间带出这几句。

通读全书，觉得“科学性”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原则，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倒是有些楹联、成语，往往溢出所在章回的拘囿，具有更丰富的含义，此则原则性便应该要辅之以灵活性了。比如太虚幻境石碑坊联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还有无”，曾数度出现于书中，虽寥寥一联，却字字浸透人生世象，哲理玄思，禅佛意味，其义甚广，以至于作为名联，常被援引，这也正是体现红楼一书厚重之点。在能提供巨大阐释空间的地方，作者理应扬己之长，跳出书外，至少略加铺展，而不必拘泥于自划边界不前，就事说事，如此则这部《全钞》，或许更能增添亮色。

为红学再添一抹殷红

——读朱增泉《红楼梦诗词全钞》

□吴平安

